

欲振翅的海燕： 臺靜農來臺前的思想取徑與主體鍛造¹

許霖²

摘要：本文試圖從主體意識鍛造的角度深入臺靜農來臺前的創作，及其創作與時勢的共振關係，梳理其思想上的取徑與變化。臺靜農早年創作雖受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浸染，呈現出「革命」意識的萌芽，內核卻更多地是民族主義心態下過渡時代「知識人」思想資源的內部調整。隨後小說集《建塔者》反映出臺靜農在 1930 年前後主體意識的緊張與拉鋸，「革命+戀愛」的小說書寫映射出臺作為「知識人」欲為「革命人」而不得的精神和實踐上的雙重困境。但此階段的「革命」實踐亦已悄然滋養了他的思想底色。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臺靜農通過不肯甘休的現實批判，充實並立住了作為「知識人」的主體，並在此基礎上更深刻地內化了「革命」意識，實現了「文學與革命」實踐上的統一，也使「知識人」與「革命人」的主體意識經歷淬煉，終於相融於一身。

關鍵詞：臺靜農、主體意識、知識人、革命人

¹ 收件日期：2020/10/28；修改日期：2021/02/18；接受日期：2021/03/09
感謝施淑、呂正惠、彭明偉、黃琪椿、藍博洲、劉人鵬老師在本文形成過程中在不同場合給予的寶貴建議，也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和編委會給予的鼓勵和詳細意見，以及編輯團隊的仔細校閱。本文若有謬誤之處，皆屬作者自身的責任。

²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The Stormy Petrel About to Fly: Tai Jingnong'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Formation Before Going to Taiwan³

Xu, Lin⁴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ai Jingnong's works before October of 1946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ping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the reson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works and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and sort out his path and changes in thought. Although Tai Jingnong's early works were influenced by anarchist thoughts and indicated the budding of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the core was more concerned with a nationalistic adjustment of traditional conception of the "scholar" in the transitional era. His subsequent novel collection *The Tower Builders* showcased Tai Jingnong's entangled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round 1930. The writing of "revolution + love" novels reflected the dual dilemma of spirit and practice: the failure of an "intellectual" who intends to be a "revolutionary". Nevertheless, th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t this stage has quietly nourished his ideological background. With the full-scale outbreak of China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³ Received: October 28, 2020; Sent out for revision: February 18, 2021;
Accepted: March 09, 2021

⁴ PhD Student,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nd Culture Studies,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Japanese Aggression, Tai Jingnong has enriched and established hi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s an “intellectual” through constant criticism of the reality, on the basis of which his consciousness of “revolution” has been internalized more deeply. Meanwhile, Tai maintained the consistency of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in practice while converging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the “intellectual” with the “revolutionary”.

Keywords: Tai Jingnong,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Intellectual, Revolutionary

一、前言

目前對臺靜農（1902-1990）的評述時遊移於左翼文化人、自由派知識分子之間，⁵如此迥異的評價反映出現有的研究對於臺靜農的整體把握或許還存在著盲點，而在左翼文化人或自由知識分子之間是否尚有某種聯結的可能？由此撐開的研究空間正是亟待探明的。另外，目前對臺靜農的研究多聚焦於其早年的兩部小說集《地之子》《建塔者》，以及其來臺後的書藝，較缺乏對其創作階段性的梳理與辨析，本文正是希望能夠在此意義上，鬆動臺靜農研究中文類研究的邊界，從主體意識的型塑過程切入，以此把握臺靜農前半生作為「知識人」⁶與「革命人」的雙重性。一方面希以此研究增進對臺靜農理解，另一方面，也嘗試在左翼語境下，豐富「革命人」意涵的個體實踐經驗，並從中凸顯臺靜農的特殊性。

⁵ 「左翼文化人」的接受面更為廣泛，如大陸學者陳漱渝：〈臺靜農曾是中共地下黨員〉，《百年潮》，第 1 期（2000 年），第 51-53 頁；臺靜農的臺灣學生施淑：〈蹤跡（下）〉，《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12661/4831806>（瀏覽日期：2020 年 9 月 4 日）。而「自由派知識分子」則僅見臺灣學者提及，如廖肇亨：《臺靜農亡明講史與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明代研究》，第 11 期（2008 年 12 月），第 95-118 頁、廖肇亨：《導論二：「只有漆黑」：〈亡明講史〉及其相關問題》，臺靜農著、廖肇亨校注：《亡明講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 年 5 月），第 xxviii 頁。

⁶ 即「知識分子」，為與「革命人」並置，稱為「知識人」，但意涵則並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識」的人，而是如余英時所論，是在具有專業知識的同時，有著超越私人利益的公共關懷，見余英時：〈自序〉，《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2。亦有「過渡時代讀書人」或轉型期「士人」的新舊交替之際之意，後文稍有交代，但篇幅所限，關於此詞涵蓋的範圍與演變無法做太詳盡的討論。

臺靜農曾在他 1930 年出版的革命小說集〈建塔者·後記〉中將他筆下的「革命者」喻為高爾基（Maxim Gorky）的「海燕」，⁷稱讚他們「作了這暴風雨的先驅」，而他來臺前的思想取徑與創作歷程卻猶如從「負傷的鳥」到「海燕」的主體鍛造，呈現出「知識人」與「革命人」意識由分離到融合為一的過程。故本文試圖以「欲振翅的海燕」之譬喻，勾連臺靜農在 1946 年來臺之前主體狀態與文學實踐和左翼革命理想、變動不居的歷史情境之間的張力關係。

二、無政府主義與「俠」、「士」

臺靜農創作中最早的「革命」意識萌芽應是對「刀劍」意象、刺殺情節的反復書寫，這一創作傾向甚至延續到了晚年。渡海前詩文中涉及此類意向與情節的，有 1922 年的新詩處女作〈寶刀〉、1926 年的新詩〈請你〉、1928 年小說〈我的鄰居〉、1938 年的舊詩〈滬事〉和寓居白沙時期的〈讀史〉等，因而有論者注意到其赴臺前的左翼思想與無政府主義的關係。⁸但卻少有人留意，臺靜農受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與此思潮在中國從高潮到低落的傳播過程是吻合的，隨著時間的推移，臺靜農愈發展現出其思想與無政府主義之間的裂隙，他對國家、社會和個人自由的看法，沒有走向無政府主義式的激進，而他個人的左翼理想，後來也更接近現實主義而非烏托邦。事實上，臺靜農的思想雖表面上與無政府主義思潮有過

⁷ 〈海燕之歌〉（Песня о Буревестнике, The Song of the Stormy Petrel），又名〈海燕〉，是由前蘇聯詩人高爾基 1901 年 3 月創作。預言了 1905 年的俄國革命，讚美了海燕迎擊暴風雨的精神。

⁸ 鄧謙林：〈論臺靜農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及其與魯迅之關係〉，《東嶽論叢》，第 38 卷第 6 期（2017 年 6 月），頁 158-163。

共振，其內核卻更多地繼承了傳統中對儒墨一脈反叛的部分，其實質是過渡時代「知識人」思想資源內部的調整和反傳統地繼承傳統，表現於外即為「士氣」和「俠氣」的表裡統一。

無政府主義雖傳入中國頗早，但其真正崛起卻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和結束這段時期，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時間也有重疊。⁹而這段時間，正是臺靜農離開家鄉，前往漢口中學就讀，後又進入北大求學的時間。其 1922 年的處女作、新詩〈寶刀〉¹⁰和 1926 年的小說〈我的鄰居〉¹¹分別讚頌了日本青年長岡良一殺死摧殘人類的「惡魔」¹²和鄰居的朝鮮青年策劃「炸皇宮」以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事蹟，均明顯可見無政府主義暗殺風潮的影響。他 1923 年在北大還選修了世界語（Esperanto），¹³亦回應著當時無政府主義的風行。

除暗殺等暴力革命元素外，臺靜農早期的創作中較明顯地提及無政府主義思想的，主要見於 1926 年的〈夢的記言〉¹⁴和〈人獸

⁹ 楊念群指出，其主因是一戰後中國知識界對現代民主「國家」制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產生了嚴重懷疑，開始思索通過社會改造取代國家主義的路徑。參見楊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會」觀念的形成與新型組織的誕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頁 84-85。

¹⁰ 臺靜農（靜農）：〈寶刀〉，《臺靜農全集·白沙草龍坡草》（鄭州：海燕出版社，2015 年），頁 119-122。

¹¹ 臺靜農（靜農）：〈我的鄰居〉，《臺靜農全集·地之子》，頁 1-14。

¹² 應為日本鐵路工人中岡良一，1921 年 11 月 4 日刺殺了日本首相原敬。

¹³ 世界語（Esperanto）原意為希望，傳入中國卻被譯為「世界語」（循日譯）或「萬國新語」，呼應中國知識分子對世界大同的理想，因與無政府主義相通的訴求，與無政府主義運動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培、師復、吳稚暉等人都介紹宣傳過世界語。

¹⁴ 臺靜農：〈夢的記言〉，陳子善、秦賢次編：《靜農佚文集》（臺北：聯經，

觀》¹⁵，但這兩篇散文的寫作傾向卻已經轉向了現實主義、民族主義¹⁶。〈夢的記言〉寫於「三·一八」前不久，其中反對青年盲目地為達到「光榮的死」，而為「皇上」、「國家」、「主義」獻身，聯繫下文臺靜農對民族性的批判，希望喚回「反抗本能」和「可貴的野蠻」，請人們不要寄望於「明天」、「美麗的天國」，可知臺靜農的重點不在於消解國家和主義，而是呼籲青年們珍惜生命，認清並把握現實，積極投身眼前的反抗中，不啻為隨後學生運動的先聲。〈人獸觀〉寫於「三·一八」後，主要為諷刺「現代評論派」的「正人君子」們。此文開頭提到「德謨克來西」「共產學說」「互助說」「安斯坦相對論」等，他調侃說「人家的學問我們都是有的」，還煞有介事地將〈山海經〉與進化論聯繫起來。臺靜農不是國粹主義者，但他的論述卻會很自然地回到傳統，而不是從外來的理論中汲取資源，這一方面與他少年以來接受的傳統文化訓練有關（當時他還在北大國學門研究所學習），一方面也與一戰後，中國知識界對西方制度、理論的疑慮有關，以致生發了某種回避「西強中弱」論述的微妙的民族情緒。

事實上，臺靜農的第二篇小說，寫於1924年的〈途中〉¹⁷就已與無政府主義劃下界限，走向了烏托邦的反面。文中「我」的弟弟是教會的學生，會唱勞工們的歌謠，很可能參加了某個「工讀互助

2018年），頁63-67。

¹⁵ 臺靜農：〈人獸觀〉，《靜農佚文集》，頁68-76。

¹⁶ 此處的「民族主義」，並非指向現在的「國家主義」，對於經歷過晚清與民國之過渡時期的知識人，「民國」並不是先驗成立的，臺靜農接受的民族主義與魯迅相近，是以「民」為基礎，即健全的國民和國民意識在國家意識之前。

¹⁷ 臺靜農：〈途中〉，《靜農佚文集》，頁8-15。

團」，他抱著「我們都是主的兒子，我們都是親愛的兄弟」的互信互愛的信念在世上生活的，最後自相殘殺的人們卻將他送入了瘋人院。可以說，臺靜農一開始就敏銳地擊中了無政府主義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因為無政府主義者最難以解決的倫理困境，就是如何克服人類固有的「通性」造成的「惡」的一面，¹⁸無政府主義秉持對理性和道德樂觀主義的態度，認為絕對自由的個人會按照互助的本能融為一體，這實際上卻是出於理想主義的想像。作為二十歲出頭的青年，臺靜農的思想不免受到社會思潮的浸染，也好奇和瞭解過無政府主義的學說，但從其創作生涯的起點，就能夠看到他與無政府主義同行的終點，因為他在最基本的倫理方面已拋棄了過分抽象和理想化的互助論，而採取了對人性務實的態度。臺靜農能夠從一開始就對理想世界抱持著務實的態度，其實也得益於五四第一代無政府主義實踐的經驗，1920-1923年，五四時期轟轟烈烈的新村主義逐漸退潮，大量的工讀互助團也相繼解散，某種程度說明了無政府主義思想上的不切實際和經濟實踐、分配上的缺乏成效，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階級鬥爭學說逐漸興起，臺靜農也於「三·一八」慘案後（1926或1927年）加入了共產黨。¹⁹1920年代臺靜農的思想與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共振，

¹⁸ 楊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會」觀念的形成與新型組織的誕生》，頁132。

¹⁹ 一說據王效挺、黃文一編：《戰鬥在北大的共產黨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79。臺靜農於1927年在北大入黨，即臺靜農從國學門研究所畢業前。另一說據葉孝慎引王治秋的材料稱臺靜農於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見葉孝慎：〈燃燈人之殤——說臺靜農研究中的空洞或盲點〉，《現代中文學刊》，第2期（2020年4月），頁56-60。脫黨時間則未有確證。

正處於無政府主義由盛轉衰的階段，決定了他對無政府主義的接納只會停留在表面，他未來得及參與無政府主義的實踐，卻見證了其的失落與挫敗，因而也沒能成為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者，後來更是在黨派、主義、民族國家、社會的認識和行動上與無政府主義的激進主張背道而馳。

雖未成為無政府主義者，臺靜農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的詩作中依然常出現對刺殺的讚美，但形式上已改為借用荊軻的典故針砭時事，如作於 1938 年的〈滬事〉回憶 1932 年朝鮮志士尹奉吉（윤봉길）炸死日本駐滬派遣軍司令白川義則的事蹟，誇他「一擊真堪敵萬夫」，後又作〈讀史〉讚美荊軻。²⁰ 渡海來臺後，晚年〈觀秦始皇車馬墓〉（1984 年）再次提到荊軻：「離橫約縱已蹉跎，頽勢難揮反日戈。若使荊卿決一劍，後來青史又如何。」²¹ 當時臺灣未解嚴，但政治空氣已鬆動，臺靜農這首詩使人看到了久在匣中的寶劍，偶爾抽開劍鞘，依然散發著幽幽寒光的一面。他來臺前的詩作中亦常見「刀劍」的意向，如〈去住〉和〈乙酉歲暮〉有「長劍照雙眸」、「風塵一劍敝霜裘」。²² 臺靜農對刀劍和荊軻這位「遊俠」的尊崇，並非故吐豪言，也不止是出於文人在國難之際尚俠輕生、殺身成仁的審美趣味，其背後的思想理路，與他走近無政府主

²⁰ 〈讀史〉作於四川白沙時期。關於〈滬事〉和〈讀史〉兩詩的內容和寫作時間的推測見羅聯添：《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 年），頁 251、319；臺靜農：《臺靜農全集·白沙草龍坡草》，頁 4。

²¹ 臺靜農：〈觀秦始皇車馬墓〉，《臺靜農全集·白沙草龍坡草》，頁 102。

²² 臺靜農：〈去住〉、〈乙酉歲暮〉，《臺靜農全集·白沙草龍坡草》，頁 25、30。

義，乃至後來走近共產主義是相似的，都是出於民族主義的心態和訴求，誠如羅志田所言：「近代中國士人一方面有意識地要想疏離於『野蠻落後』的中國而認同於『優越的』西方，另一方面又更願意認同於西方思想資源中文化認同最不明顯或最具超越性的那一部分。他們在不得不學習西方的過程中，對外來的各種思想觀念，有意無意間總是選擇最少民族認同的『主義』，如無政府主義、世界主義、社會主義等。」²³ 從臺靜農多次使用刀劍意象和遊俠典故，卻未真正參與過暴力行動可知，他並非真的準備使用暴力手段參與革命，只是希望通過文字抒發自己的民族情緒或報國情懷。

為何臺靜農選擇用遊俠的題材和典故來表達民族主義的情感，則牽涉到臺靜農作為過渡時代²⁴ 知識人，²⁵ 其繼承的思想資源、面臨

²³ 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245。

²⁴ 見梁啟超：〈過渡時代論〉，《飲冰室文集（點校版）·第2集》（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710-713；胡適亦曾說自己身上有「中國的我」和「西洋廿世紀的我」，「這是過渡時代的現象，也可以觀世變了」，見胡適：〈致陶孟和信一通（1918年5月8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0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頁103。

²⁵ 過渡時代的士人向知識分子轉型的過程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從晚清開始，至少涉及五四前後的兩三代人。臺靜農生於1902年，他的啟蒙時期正落於清季民初的節點，且作為「五四」的「二代」（或「三代」，姜濤在《公寓裡的塔》中將1900年初10年間的青年，即臺靜農一輩的年輕人稱為新青年的「第三代」，「文學青年」，但他也承認，代際之間的交叉、滲透和位移都十分常見，不能機械劃分，見姜濤：《公寓裡的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7。而根據臺靜農經歷和思想取徑，臺其實更具其所劃分為第二代的「學生一代」的特徵，此不細論），同時接受了魯迅、陳獨秀、胡適等第一代新文化運動旗手的影響，新與舊共構了他思想的一體兩面。

的歷史環境和社會訴求與傳統士人之間的異同。晚清對遊俠的重新追憶和詮釋，將本為「儒、墨皆排擯不載」（〈史記·遊俠列傳序〉）的遊俠，與儒、墨重新掛上鉤，爭論俠是「出於墨」還是「出於儒」，其實都是將傳統中較為底層、邊緣的文化，重新納入主流傳統中進行詮釋。²⁶ 這一思想資源上的調整，與傳統士人在家國杌隉背景下的轉型有關。清季民初，隨著傳統士大夫參與政統的道路逐漸斷絕，士回到了類似春秋時代的「遊士」的漂浮狀態，思想上遂較為通脫，因而能夠引入儒墨主流以外的思想。過渡時代的士人因時局的刺激，因憂世而憂生，因憂生而生空虛之感，故而自然地趨近於佛家、道家，²⁷ 亦正如陳平原指出，對「遊俠」的重新解讀，得益於晚清諸子學和佛學的復興，及以民間文化代表的小傳統與儒釋道為代表的大傳統之間的溝通。²⁸ 其中道家、佛學、民間文化都是儒墨外的傳統，亦是錢穆所說的「下傾性」的思想資源（所謂上傾性是偏向政治，以儒墨之學為代表，下傾性則是從下層努力，關心社會大群體）。²⁹ 但無論如何調整，這些思想資源都還是屬於傳統的一部分，

²⁶ 如譚嗣同將墨俠並舉，章太炎將儒俠並舉等，如龔鵬程所說，無論其（俠）溯源於儒抑或墨，共同主張即是統合士風和俠氣。相關討論可見於龔鵬程：〈俠骨與柔情：論近代知識份子的生命型態〉，《近代思想史散論》（臺北：東大圖書，1991年），頁102-103；陳平原：〈晚清志士的遊俠心態〉，《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89-290。

²⁷ 龔鵬程：〈俠骨與柔情：論近代知識份子的生命型態〉，《近代思想史散論》，頁105-108。

²⁸ 陳平原：〈晚清志士的遊俠心態〉，《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頁289、306-312。

²⁹ 錢穆：〈中國知識份子〉，收入許紀霖編：《20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史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頁77。

對於臺靜農這樣的過渡時代知識人，「遊俠」題材的激進表達，一面呼應著民族危亡之際的慷慨獻身情緒，一面也反映出他對「士」之精神內核——「道」統的反傳統地繼承，以曾經邊緣、下傾的傳統資源來挽回即將消亡的「道」於狂瀾。民族主義情懷刺激下的俠氣，其實正對應著「取義存仁」的士氣，與傳統士人「明道救世」「道濟天下之溺」的修身要求和社會責任更是一脈相承，其外在的俠氣與內在的士氣不過是一體兩面。

更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中國古代的「道統」高於民族、朝代、君主，臺靜農的民族主義也並非指向先驗的民族與國家，或某黨某派，而是以健全的國民意識為根。其筆端的俠氣與中國古代遊俠亦有區別。他的新詩處女作〈寶刀〉鼓勵「弟兄們」要為「同胞」「人類」不斷地跟惡魔作鬥爭，³⁰當時即可看出，臺靜農對俠氣的推崇，不只是像古代的「遊俠」一樣為實現個人價值和個人的反抗、復仇，而是指向某種社會群體性的理想，呼籲的是青年和志同道合者在共同的社會理想下的聯合和革命，他的自我覺悟和革命意識，一開始就寓於大群體中，只是此後隨著時勢的變化、革命高潮與低谷的起伏，在文學與革命、個人與群體的拉鋸間，其主體意識也不斷地遭遇著困境，在變動中被型塑著。

三、「革命人」與「知識人」之張力

臺靜農的兩本小說集《地之子》與《建塔者》中，較受關注的無疑是《地之子》，不僅有 4 篇小說選入魯迅編選的《中國新文學

³⁰ 臺靜農（靜農）：〈寶刀〉，《臺靜農全集·白沙草龍坡草》，頁 119-122。

大系（小說二集）》，還得到很高的評價。³¹ 後來的評論家也顯然更為重視《地之子》，而對《建塔者》評價不高，如唐弢認為「由於生活不足，人物形象較之以前的諸作反顯蒼白」，³² 而臺靜農的學生樂蘅軍亦委婉地表達了對於臺靜農 1930 年後未能從《建塔者》中的「激烈而沉重的憤心」回到《地之子》中「屬於常心、常性的大悲心」，使得一位優秀的小說家消失了的惋惜之情。³³ 事實上，若我們將視線稍稍由作品擴大到作者身上，將《建塔者》的寫作時間與臺靜農當時的革命實踐，以及當時瀰漫在思想界的氛圍結合起來，便能重建一位剛參加革命的青年，在革命轉向低潮時，充滿激情卻迷茫、苦悶的「知識人」形象。

據〈建塔者·後記〉，此書中的 10 篇小說均作於 1928 年。³⁴ 其中 7 篇以革命為主題的小說中，有 4 篇（〈建塔者〉〈死室的彗星〉〈遺簡〉〈鐵窗外〉）都涉及了愛情的情節或亦以此為主題。前人嘗將 1930 年前後小說中革命與戀愛的關係分為兩種，即革命與戀愛相容或兩者衝突，臺靜農這類小說有趣的地方在於，革命與戀愛相容時，兩個主角必然都是革命者，如〈建塔者〉中的瑪麗和 E，〈死室的彗星〉中的逸生君與庚辰君；而兩者衝突時，主角則都是「我」

³¹ 「他卻貢獻了文藝；而且在爭寫著戀愛的悲歡，都會的明暗的那時候，他將鄉間的死生，泥土的氣息，移在紙上的，也沒有更多，更勤於這作者的了」，見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魯迅全集·第 6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頁 263。

³² 唐弢：《中國現代文學史（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年），頁 206。

³³ 樂蘅軍：〈悲心與憤心〉，林文月編：《臺靜農先生紀念文集》（臺北：洪範書店，1991 年），頁 246。

³⁴ 臺靜農：〈建塔者·後記〉，《臺靜農全集·建塔者》（鄭州：海燕出版社，2015 年），頁 103。

（〈遺簡〉〈鐵窗外〉）與一位革命女性。³⁵「我」對愛人的稱呼都是「崇敬的你」，而感到自己「慚愧」、「渺小」、「笨拙」、「無用」，比起愛人來處於較低階的位置，因而不願「玷污了我所崇敬而不能親近的人」，³⁶在此，「我」的身分和位置顯得奇特而曖昧。

〈遺簡〉中的 K 的「出走」是很特別的男性出走，他本是堅定的革命者，卻由於對同志產生愛情而動搖了革命的信念，在女友的勸慰下與之分別，重新走向了革命的道路，K 的出走不是為了背叛愛情而走向革命，而是為了追趕上精神更進步的女性同志革命的步伐，將對愛人的愛擴大為對人群的大愛。〈鐵窗外〉中的「我」，看到女友來探監時覺悟「我當更充實了我的力量，為了我們崇高的人群的塔，為了我所崇敬的你」，³⁷也將小愛融入對群體的犧牲奉獻中。對於臺靜農來說，愛情似乎就是革命的涓涓細流，終將，也必須匯入革命的洪流，革命與戀愛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係，革命的優先順序高於愛情。「我」的羞慚往往源於意識到自己不夠革命、能力不足、思想境界太低，配不上所愛的人，不足以承擔革命的重任。與其說這種愧作是對愛人的，不如說是對革命的，此二文中女性實際代表著「我」的革命想像，成為了革命的具象投影。

1928-1930 年前後，臺靜農與一名女性友人孫祥偈也往來甚密，這段經歷或許成為他小說「革命+戀愛」經驗的來源。1928 年 4 月，因未名社遭查抄，李霽野與臺靜農共同在獄五十天，³⁸據他回憶：

³⁵ 〈遺簡〉中的「K」雖不是敘述者「我」，但占主要篇幅的 K 的遺書也是以第一人稱「我」書寫的。

³⁶ 臺靜農：〈遺簡〉，《臺靜農全集·建塔者》，頁 56。

³⁷ 臺靜農：〈鐵窗外〉，《臺靜農全集·建塔者》，頁 59。

³⁸ 因韋素園和李霽野譯的《文學與革命》，在山東省立第一師範李廣田、鄧廣銘處出售時被張宗昌查抄，張宗昌電張作霖，京師員警廳查抄未名社，

「獄室鄰院海棠花落時，靜農還寫了一首詩：〈獄中見落花〉，表現了他對一位女友的純正的友誼」，³⁹ 這段情節後被寫入〈遺簡〉中，而這位女友就是孫祥偈。1928年5月28日，臺靜農出獄後不久，魯迅日記中就提到「孫祥偈、臺靜農來訪，未遇」。⁴⁰ 臺靜農在〈建塔者·後記〉中提到出獄後，「適友人編某報副刊，復以筆名發表者五篇」，⁴¹ 即指孫祥偈任職的《新晨報副刊》。1929年5月17日魯迅給許廣平的信中說，「臺靜農在和孫祥偈講戀愛，日日替她翻電報號碼（因為她是新聞通訊員），忙不可當」，⁴² 6月1日又提到：「晚上來了兩個人，一個是為孫祥偈翻電報之臺，一個是幫我校《唐宋傳奇集》之魏」，⁴³ 可知臺當時與孫關係親密，但據舒蕪回憶：「桂林師院國文系主任譚丕模教授，恰好也是靜農先生的老友。他說他最佩服靜農先生年輕在北京時，沒有接受某一位著名的才女的熱烈追求，不接受不希奇，難得的是沒有像通常情形那樣愛不成便成了仇，『真不知道靜農怎麼處理得那樣好的！』」，⁴⁴ 加上李霽野稱兩人是「純正的友誼」，也可能「講戀愛」只是魯迅的一種調侃。臺與孫的來往應至少延續至1930年，那年臺發表的唯一一篇文章〈一九三〇年試筆〉就登在《新晨報副刊》上，隨後因臺靜農又暫

李霽野、臺靜農在前門警察局被關了五十天。見李霽野：〈踐踏未名社的屠伯——北洋軍閥〉，《李霽野文集·第2卷》（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頁70-81。

³⁹ 李霽野：〈從童顏到鶴發〉，《李霽野文集·第2卷》，頁338。

⁴⁰ 魯迅：〈日記十八（一九二九年）〉，《魯迅全集》，第16卷，頁135。

⁴¹ 臺靜農：〈建塔者·後記〉，《臺靜農全集·建塔者》，頁103。

⁴² 魯迅：〈致許廣平（19290517）〉，《魯迅全集》，第12卷，頁165。

⁴³ 魯迅：〈致許廣平（19290601）〉，《魯迅全集》，第12卷，頁183。

⁴⁴ 舒蕪：〈憶臺靜農先生〉，陳子善編：《回憶臺靜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73。

時停止了文藝創作，沒有更多的線索可供推測兩人關係走向。由其他材料可知「一·二九」運動期間孫祥偈已與張申府在一起了，⁴⁵ 觀孫祥偈抗戰後在重慶的政治活動，及對毛澤東〈沁園春·雪〉的詩詞唱和，⁴⁶ 孫始終未改其對革命和政治的熱情。目前尚無資料說明臺靜農與孫在抗戰時的重慶有往來，兩人後來或已漸行漸遠。

孫的經歷使人聯想到臺靜農筆下令人崇敬的革命女性，或許也可以大膽地猜測臺對孫的心態與其筆下的「我」和「K」的心境是相似的，而登於《新晨報副刊》的〈遺簡〉和〈鐵窗外〉也可視為對對方的某種自白。臺靜農在 1926 年的「三·一八」慘案後，加入了中共，寫《建塔者》時，臺靜農還在黨，而令人困惑的是作者臺靜農和筆下主角的實際身分都是「革命者」，為何還以如此卑微的心態想像革命，對待自己「崇敬的同志」？作者的主體意識與「革命者」的設定間似乎存在著顯見裂隙。與現實不同的是，小說中的「我」與「K」都在愛情中得到了充實和提高自我的力量，進一步犧牲奉獻，走向革命，而臺靜農卻直到出版《建塔者》的 1930 年都自認為是「徘徊於墳墓荒墟而帶感傷的作者」、⁴⁷「深藏在這無聲的殼中」的「不上進者」，⁴⁸ 這或許也可供我們猜度他未與孫祥

⁴⁵ 舒衡哲著，李紹明譯：《張申府訪談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 年），頁 98。

⁴⁶ 抗戰開始之後，孫祥偈來到大後方重慶，1943 年參與組織中國民主憲政促進會，任常務理事兼婦女委員會主任委員，1945 年參與組織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1945 年 11 月 14 日，毛澤東著名詞作〈沁園春·雪〉發表於重慶《新民報晚刊》，柳亞子等親共文人紛紛唱和，孫祥偈也參與其中，以「孫蓀荃」之名於 1945 年 12 月發表和詞。轉引自汪成法：〈《魯迅全集》內外的孫祥偈〉，《魯迅研究月刊》，第 5 期（2014 年 5 月），頁 55-58。

⁴⁷ 臺靜農：〈建塔者·後記〉，《臺靜農全集·建塔者》，頁 103。

⁴⁸ 臺靜農：〈一九三〇年試筆〉，《靜農佚文集》，頁 148-149。

偈真正同行的原因。⁴⁹

1928 年底出版的《地之子》中藏著一則可供一窺臺靜農當時精神困境的隱喻，即〈白薔薇〉⁵⁰ 中的「負傷的鳥」。此意象本形成於 1923 年臺的處女作〈負傷的鳥〉，那篇小說中，他形容自己一位得了肺病的朋友「是『負傷的鳥』，帶著箭，帶著痛，帶著血腥，向渺茫的天空，無力的飛去！」卻又借朋友的自敘表達了背負苦痛前行的決心，以及化苦難為力量、義務的向上的精神面貌：「我堅決的自誓，我情願帶著傷在死的掙扎中，努力愛護我的箭。……在這無力的臂膀上，負著不能不往前曳的重擔，雖然這是不幸，或者尚有真確的人生的意義。」⁵¹ 而到了 1928 年的〈白薔薇〉中，積極的表達皆已刪除，僅在文末留下感歎疑問句：「啊，我是負傷的鳥，帶著箭，帶著痛，帶著血腥。能夠讓我向渺茫的天空，無力地飛去嗎？」這種句式上的變化，以及置於文末的強調，不免使人感到「渺茫」與「無力」的確然。儘管此文的頹唐或與好友病重有關，⁵² 但或許正是某種隱喻的預言性，「負傷的鳥」隨後亦時隱時現於臺靜

⁴⁹ 此外觀臺靜農與家人間相處，他的家庭觀念是很重的，或是由於身為過渡時代的知識人，還遺存傳統的家庭與愛情觀。在那個打破舊家庭、舊傳統的激進婚家觀的時代，1919 年臺的好友韋叢蕪、李霽野即登報解除父母訂的婚約，臺 1924 年卻回鄉踐履父母代訂的婚約。

⁵⁰ 此文結尾稱其改成於 1928 年 8 月 12 日，根據《地之子》中各篇的發表時間，可知此文是最後收錄的，也是《地之子》中完成於 1928 年的唯一一篇小說，故有與《建塔者》參讀的意義。見臺靜農：〈白薔薇〉，《臺靜農全集·地之子》，頁 141。

⁵¹ 臺靜農：〈負傷的鳥〉，《地之子》（臺北：遠景，1990 年），頁 154-155、169-170。

⁵² 臺靜農改寫這篇小說的直接原因或許與患肺結核的好友韋素園有關，見臺靜農：〈後記〉，《臺靜農全集·地之子》，頁 144-145。

農的創作與心境中。

臺靜農在〈一九三〇年試筆〉中提到，自己自 1928 年 10 月 15 日到 1930 年 3 月 20 日左右都未動筆，是因為在輟筆前感到一種矛盾：「我們同是一樣的青年，又同處於一樣黑暗重壓之下，可是我們的心情和行為，顯然劃成了兩個時代；唉，我是懦怯、頹廢，將毀滅於黑暗的重壓之下了。」⁵³ 輟筆前臺靜農的最後一篇小說是〈白骨〉（〈歷史的病輪〉），也是一篇讚揚革命精神的小說，他當時雖感受到了自己的行動和思想狀態與左翼理想間矛盾，寫作的心境卻仍是「興奮」的，或許因為當時他才入黨一、兩年，又有驚無險地渡過了一次牢獄之災，加上與孫的「友誼」，依然燃燒著創作的熱情。但隨著時間推移，他卻感到「這種說不出的苦悶，以我年來所見所聞的經驗，似乎與我同此心境的確有其人」，⁵⁴ 愈是發覺時代的氛圍和青年的頹唐，愈是無法重新提筆，因為「但願這苦悶僅僅屬於我們少數者的所有物，再不願傳給多數的朋友們」，⁵⁵ 這篇文章之後，他又作了〈建塔者·後記〉，就再次停筆，直至 1937 年，六年間只作了兩篇論文（1931、1936）和一篇應邀的序文（1936）。⁵⁶

這種苦悶首先源於前述其主體意識與「革命者」間的裂隙，〈建

⁵³ 臺靜農：〈一九三〇年試筆〉，《靜農佚文集》，頁 148-149。

⁵⁴ 臺靜農：〈一九三〇年試筆〉，《靜農佚文集》，頁 149。

⁵⁵ 臺靜農：〈一九三〇年試筆〉，《靜農佚文集》，頁 149。

⁵⁶ 即青曲（臺靜農）：〈中國文學起原之研究〉，《平等》，第 1 卷第 1 期（1931 年 3 月）；臺靜農：〈從「杵歌」說到歌謠的起源〉，《歌謠週刊》，第 2 卷第 16 期（1936 年 9 月），現收於臺靜農：《臺靜農全集·淮南民歌集》（鄭州：海燕出版社，2015 年），頁 125-140；臺靜農：〈《擇偶的藝術》序〉，《靜農佚文集》，頁 156-158。

塔者〉中洩露了臺靜農對自身定位的線索。這篇文章是以第一人稱作的，「我」是一位工人革命者，訴說對象是我的「朋友」——「關著門弄文學的人」。當「我」對「朋友」說「請你千萬不要更為頹喪」「你真太懦怯」，並試著用革命者的口吻說服朋友「你該相信」「我可以擔保，有那一天」時，實際卻暴露了臺靜農的自我意識更接近那位弄文學的朋友，而非作為革命者的「我」，因為作者自認為是頹廢、怯懦的。臺靜農對革命的前景是抱有信心的，從《地之子》的鄉土小說中悲憫同情地書寫農民，到《建塔者》的〈井〉中刻畫無產者的血淚，揭露革命與土地的關係，號召農民參與革命，可知他已經對革命的本質和動力有了一定的把握，也對革命的走向有深刻的洞察。但與之相對地，他卻從未相信自己能夠成為「塔的基礎」，只能勉力用貧乏的筆「渲染時代的光」。⁵⁷ 知識分子與黨員的雙重身分，是其主體意識分裂的關鍵。前文所述之「我」與愛慕的女性同志的關係恰如作為「知識人」的臺靜農與革命的關係，嚮往、傾慕卻又裹足不前，怯懦難安。他暫時還無法在革命中找到妥當安置自己的位置，無法回答如果不流血犧牲，「知識人」在革命中能起什麼作用？他的身分雖是中共黨員，情感上卻處於愧怍、迷茫、苦悶的狀態，因而在文本中呈現出「知識人」與「革命人」間的緊張的張力。

臺靜農當時主體狀態的緊張感與時代氛圍和知識分子面臨的境況有關。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摧毀了北京五四以來的革命力量，雖有大批知識青年左傾，卻紛紛南下投筆從戎，1927年「四·一二」清黨後國民政府定都南京，處於軍閥控制下的北平的臺靜農，更像處身於一個寂寞的舊戰場中。1927年的清黨和「七·一五」

⁵⁷ 臺靜農：〈建塔者·後記〉，《臺靜農全集·建塔者》，頁103。

武漢分共，喻示著北伐停滯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失敗，但隨著現實政治的失敗而來的，也是「階級鬥爭的進一步激化和明朗化」，在文化領域「使得原本相對處於超越地位的知識階級面臨立身的困境和痛苦的抉擇」。⁵⁸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改北京為北平，宣告了北伐結束，年底的東北易幟更標誌著國民政府在名義上統一了全國。正如周作人當年底所說：「本來能革命的自然最好還是革命，無如現今革命已經截止」，⁵⁹雖然名義上的大革命已經成功，而眼前的黑暗卻絲毫未褪，外來侵略者亦虎視眈眈，即是當年對現實依然懷抱不滿的青年面臨的無措處境。臺靜農雖或因剛入黨不久，或因剛出獄而保持著激情，卻也同樣面臨時代的拷問，即知識階級如何在下一階段的革命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任務，文藝與革命的關係，知識階級如何獲得革命意識等。〈建塔者〉等一系列小說的意義在於，它們沒有簡單地交出答卷，而是客觀地反映出臺靜農這類原本的「文學青年」、當時的「革命青年」某種普遍性的心理狀態和困惑。

1928-1929年的革命文學論爭即發生在同一時期，創造社成員成仿吾、李初梨試圖以提倡革命文學乃至無產階級文學回應同樣的難題，卻遺憾地失之簡單武斷和歷史斷裂，比如他們認為革命的智識階級對「全無產階級意識」的產生有決定性的作用，卻忽略了掌握理論並不同於獲得無產階級意識；⁶⁰不自覺地壟斷「無產階級

⁵⁸ 程凱：《革命的張力：「大革命」前後新文學知識份子的歷史處境與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310。

⁵⁹ 周作人：〈大黑狼的故事序〉，周作人著、止庵校訂：《永日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86。

⁶⁰ 見李初梨：〈自然生長性與目的意識性〉，《思想月刊》，第2期（1928年9月），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編：《「革命

意識」的解釋權和代表權，實際創作時卻囿於小圈子內，不敢直面現實黑暗等。⁶¹ 臺靜農作為與魯迅交往密切的晚輩，一定對此前魯迅論革命文學的文章就十分熟悉並關注了此次論爭，⁶²1927年，魯迅在〈革命時代的文學〉中已提出「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⁶³有了「革命人」的革命意識，才能「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⁶⁴而革命意識只能經由主體在革命進程中自覺塑造，而不是通過「別人命令」⁶⁵輸入。從

文學」論爭資料選編（下）》（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頁470-483。

- ⁶¹ 相關批評見魯迅：〈文藝與革命〉，《魯迅全集（編年版）》，第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頁306-307；〈「醉眼」中的朦朧〉，《魯迅全集（編年版）·第5卷》，頁474-479；〈路〉，《魯迅全集（編年版）·第5卷》，頁509-510；〈現今的新文學的概況〉，《魯迅全集（編年版）·第6卷》，頁54-58。
- ⁶² 1928-1929年臺靜農與魯迅的通信較少，但其時臺靜農的好友韋素園在西山養病，臺靜農的小說集《地之子》的〈後記〉（1928/10/29）提到「有些篇的構思簡直是成就與病榻前醫院中」，而魯迅在1928年7月22日和1929年4月7日致韋素園的信中都提到「革命文學」，稱創造社「膽小而要革命」，革命文學作品都是「小資產階級觀念的產物，有的則簡直是軍閥腦子」，不知韋素園是否有與臺靜農討論。魯迅1929年4月20日另有一封致李霽野的信提到「革命文學」，因為此信涉及魯迅前信抱怨未名社之事，李霽野或有向同為社員的臺靜農求證，信中提到「許多人大嚷革命文學，而無一好作」。見魯迅：〈致韋素園〉，《魯迅全集（編年版）·第5卷》，頁648；魯迅：〈致韋素園〉，《魯迅全集（編年版）·第6卷》，頁154；魯迅：〈致李霽野〉，《魯迅全集（編年版）·第6卷》，頁155。
- ⁶³ 魯迅：〈革命時代的文學〉，《魯迅全集（編年版）·第5卷》，頁54。
- ⁶⁴ 魯迅：〈革命文學〉，《魯迅全集（編年版）·第5卷》，頁261。
- ⁶⁵ 「不過我想，這樣的文章是無力的，因為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

臺靜農此階段創作的小說中，可以看出他對「革命人」的理解更接近魯迅，因自身知識人的身分、北平文化圈子經歷的局限，他並不敢自認為是「革命人」，最多只是紙上戰鬥的「革命的藝術家」⁶⁶，他對革命的理解方式更偏向於同情和理解被壓迫的人民，描寫「為人民、為人生」的革命，以自發的情感浪漫地表達激情，而不是透過自我剖析、自我建構，自我覺悟要「為自己而革命」，在《建塔者》中，覺悟、反抗和行動著的都是農民和革命者，始終不是「我」，革命是「他們」的，而「我」什麼也沒有。

但又特別需要加以強調的是，這種更接近「知識人」而非「革命人」的狀態，並不是臺靜農當下的「自覺選擇」⁶⁷，而是在動態的歷史實踐中，真實的自我呈現，應避免用今日的目光賦予過往「自覺」的意義，因為臺靜農的革命實踐、浪漫激情，及因緊張的主體狀態導致的創作困境都是那個時間段真實存在的。如他在 1980 年版〈地之子·後記〉中寫道「感於朦朧的愛情，踏空的現實，閃灼的

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於八股，在文學中並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見魯迅：〈革命時代的文學〉，《魯迅全集（編年版）·第 5 卷》，頁 54。

⁶⁶ 「這藝術的武器，實在不過是不得已，是從無抵抗的幻影脫出，墜入紙戰鬥的新夢裏去了。但革命的藝術家，也只能以此維持自己的勇氣，他只能這樣。倘他犧牲了他的藝術，去使理論成為事實，就要怕不成其為革命的藝術家。因此必然的應該坐在無產階級的陣營中，等待『武器的鐵和火』出現」。見魯迅：〈「醉眼」中的朦朧〉，《魯迅全集（編年版）·第 5 卷》，頁 478。

⁶⁷ 如賴柏霖認為，臺靜農「始終選擇以文學的創作與研究，而非『實際革命』的行動，作為學者實踐人間情懷的主要方式」，見賴柏霖：《臺靜農先生小說研究》（臺北：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9 年），頁 153。

光明又捉摸不住，於是沉鬱、絕望」，⁶⁸ 那個曾經大「踏」步向前，企圖捕「捉」「光明」的時代青年，始終是臺靜農生命歷程中最珍貴的一抹亮色，也是成為其後來主體鍛造過程中必備的「爐火」的源泉，雖歷經變幻而生生不息。

1930 年底，臺靜農參與成立了北方左聯，此後，他又長時間輟筆不作文藝，可見左聯的實踐，未為他解決「欲為革命人而不得」的「知識人」困境提供太大幫助，其原因也可能是實際的，如參與實際政治的不適應，左聯內部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問題等，但臺靜農並未對此留下任何相關記載，後人僅能猜度。總之，臺靜農在 1928-1930 年左右的創作實踐，雖有顯見的瑕疵與裂隙，卻也真實地反映出由文學到革命文學，由「知識人」到「革命人」，從「詩的生活」到組織生活的困難。但在臺靜農此階段的認識中，雖感到「知識人」在思想和實踐上都落後於「革命人」，卻並未徹底否定更接近「知識人」的自我，這也為他下一階段以新的理解和詮釋方式彌合裂隙奠定了基礎。1931 年後，他將嘗試以另一種方式，去安頓身心，處理主體狀態的困境，並殊途同歸地達至「知識人」和「革命人」的合一。

四、不肯甘休的主體鍛造

如前文所述，理解臺靜農每個時期的主體狀態時，應從歷史的連續性和選擇的動態性中去把握，臺靜農再三提及「人生實難，大道多歧」，⁶⁹ 其實交織於其一生的文學、革命與學術等並非幾條澈底

⁶⁸ 臺靜農：〈地之子·後記〉，《地之子》，頁 176。

⁶⁹ 或引起評論者誤解，誤以為文學、革命、學術的歧路是出現在某個時間點，選擇了一條後便放棄了先前的路。如 2019 年世新大學賴柏霖的博論論述其

平行的道路，在某一節點擇定之後，便能排除其餘干擾一往無前，直到「此路不通」再變道。各個階段的主體意識與認同更像同一齒輪上的輪齒，主體基於理想、時勢和自身的能力、生活狀態作出判斷，文學、革命與學術在當下何者更應凸顯，前進後若又遇歧路，或再換一種方式因應、突圍，此處並非意指臺靜農選擇的困難性與被動性不存在，而是希望使以往論述中被遮蔽的「被動中的主動性」可見。「成為海燕」的主體鍛造是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抉擇過的經驗也會成為當下狀態的底色，以另一種形式存在並延續著。

1926 年臺靜農在〈關於魯迅及其著作·序言〉中寫道：「最使我高興的，是陳源教授罵魯迅先生那種『他就跳到半天空，罵得你體無完膚——還不肯甘休』的精神。我覺得，在現在的專愛微溫、敷衍、中和、迴旋，不想急進的中國人中，這種精神是必須的，新的中國就要在這裡出現。」⁷⁰ 他欽佩魯迅「不肯甘休」精神的原因是：

實頗為精當，但其所說的臺靜農卻總似走到「此路不通」的境遇下選擇另一條道路，如：臺靜農「是在人生志向、價值信仰，以及知識份子介入現實的踐行方式上，自覺選擇了有別於革命者的實踐道路」，因為他發現「進行國族救亡的主要途徑，不是革命『行動』的激進路線，而是潛心學術、『沉思』文學（後略）」，故選擇了文學而放棄革命；「臺先生的古典轉向，或可視為他在耗盡中國現代文學啟蒙理想的可能性之後，決定另辟新機，以求新生的迂回嘗試（後略）」，故放下現代文學啟蒙理想轉向古典；「是否該放下文學啟蒙的一貫信念，回歸著述育人的學者本職？」，再因對啟蒙的失望，轉向學術而棄文學。他對臺靜農職涯和創作生涯的描述似受現代化「專業分工」的影響而未能深入歷史脈絡中捕捉主體狀態的掙扎、搏鬥和微妙的變化和成熟。見賴柏霖：《臺靜農先生小說研究》，頁 82、123、129。

⁷⁰ 臺靜農：〈關於魯迅及其著作·序言〉，《臺靜農全集·關於魯迅及其著作》（鄭州：海燕出版社，2015 年），頁 2。

只有以這樣的精神才能對抗當時死水一樣的思想界，繼續「思想革命」，激發、影響和塑造國民意識，有了健全的國民，新的中國才能出現。「不肯甘休」的精神亦使人聯想到魯迅對革命的評判尺度：「所謂革命，那不安於現在，不滿意於現狀的都是」，⁷¹「革命人」應「不肯甘休」地持續對現實保持批判，而「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於現狀的同一」，⁷²正是從這個意義上，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中的臺靜農找到了勾連「知識人」與「革命人」之共通的精神資源，逐步抵抗和突破了精神與現實的困境，從文藝和行動上共同完成了其所理解的「革命人」之鍛造。

臺靜農在經歷了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創作和革命實踐的雙重挫敗（輟筆無法寫作、三次被捕）後，雖暫時擱筆，仍時刻準備著以新的方式介入現實，1937年的全面抗戰為他重新聯結文學實踐與革命實踐，重建自我與現實境遇的關聯方式提供了契機。「七七事變」前臺靜農曾為《京報·泥土文藝》寫了兩首新詩〈村落〉〈桃林〉，⁷³觀其主題，〈村落〉較似延續著《地之子》的鄉土關懷和悲憫，〈桃林〉則回應著《建塔者》中對光明的相信與企盼，有趣的是，〈桃林〉又似作者對自身（和自己創作生涯）的鼓勵：「這不是東土哲人的『方生方死』的詩麼？／／你聽，我的白髮正在浩歌！」或許亦可視為其1937年後又一創作高峰的前奏。厚積而薄發，臺靜農遂

⁷¹ 魯迅：〈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魯迅全集（編年版）·第5卷》，頁298。

⁷² 魯迅：〈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魯迅全集（編年版）·第5卷》，頁292頁。

⁷³ 臺靜農：〈村落〉、〈桃林〉，《京報·泥土文藝》第8版（1937年7月9日），轉引自王翠豔：〈臺靜農佚詩《村落》《桃林》釋讀〉，《現代中文學刊》，第2期（2020年4月），頁60-64。

以多變的創作體裁應因現實巨變，⁷⁴除原本的主要創作體裁小說外，還作散文、雜文、劇本、論文、舊詩等。他 1938-1939 年作的小說、劇本主要是為宣傳回應抗日民族統一陣線，如〈大時代的小故事〉、〈么武〉，⁷⁵但他又忍不住以「冷嘲」的方式譏諷大後方鄉紳、官僚、買辦資本家的醜態（〈被侵蝕者〉、〈電報〉、〈出版老爺〉），⁷⁶這類故事雖是在「聽將令」的背景下寫成，⁷⁷卻不一定符合統一戰線的要求，而文學性方面，因過度冷嘲，也遠不及其先前兩部小說集對現實歷史的穿透把握。⁷⁸而他自己對此類創作或許也不算滿意，多

⁷⁴ 「七七事變」對臺靜農的衝擊極大，臺一直到晚年還記憶猶新，見臺靜農：〈始經喪亂〉，《臺靜農全集·龍坡雜文》（鄭州：海燕出版社，2015年），頁 127-134。

⁷⁵ 臺靜農：〈大時代的小故事〉，《文摘戰時旬刊》，第 39 期（1938 年 12 月 18 日），後收於《地之子》，頁 199-206；〈么武〉，《靜農佚文集》，頁 37-47。

⁷⁶ 臺靜農：〈電報〉，《文摘戰時旬刊》，第 44、45 合期（1939 年 2 月），後收於《大後方的小故事》（上海：文摘出版社，1943 年 4 月三版），頁 29-40；〈被侵蝕者〉，《全民抗戰》，第 52 期（1939 年 2 月），《靜農佚文集》，頁 27-36；劇本〈出版老爺〉，《新蜀報·蜀道副刊》，第 12 期（1940 年 5 月），署名「孔嘉」，後收於《靜農佚文集》，頁 162-171。

⁷⁷ 「七七事變」後，臺靜農輾轉落腳四川白沙，直到 1946 年下半年赴臺，故本文的「抗戰時期」「白沙時期」「在蜀時期」皆指此時。時知交老舍在重慶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臺靜農受邀參加魯迅逝世二周年紀念會並作〈魯迅先生的一生〉之報告（1938），並於第二年（1939）當選文協第二任候補理事。臺靜農 1938-1939 年的文章多發表於重慶的抗戰和左翼刊物上，如《全民抗戰》《文摘戰時旨刊》《中蘇文化》等，其中給文協會刊《抗戰文藝》的文章就有四篇，是最多的。

⁷⁸ 或如樂蘅軍說「去說愛國故事和單純的諷刺，並不適合臺先生的本性；臺先生的小說很少是在說故事，而是表現人生重於說故事。」，見樂蘅軍：〈悲

年方提及「是抗戰中重慶友人編雜誌逼出來的」。⁷⁹但與十年前建塔者時期的困境相比，此階段的小說與劇本的激憤，呈現出與往不同的精神面貌，而批判的對象也更為清晰。與此同時（1938年），他就及時地調整突圍，並找到了更適合表達的體裁和方式。

這些體裁中，1925年臺靜農就寫過雜文〈壓迫同性之卑劣手段〉、〈去年今日之回憶〉控訴時任女師大校長的楊蔭榆對學生的壓迫和北洋軍閥對農民的傷害，⁸⁰抗戰時期他更以情感表達快速直接的雜文回應隨時變化的局勢，施淑贊其為「熱諷」；⁸¹臺的舊詩寫作也是在抗戰時期開始的，一方面受當時大後方文化氛圍的影響，⁸²以「酬贈之作」發揮「群」的效用，與師友共享同樣的情緒情感，一方面以述懷之作抒發幽憤，安頓己心；⁸³學術論文方面則延續著此前「下傾性」的傾向，突出了人間性與民間性，亦接續著文學革命、思想革命的傳統。⁸⁴這些不同創作體裁之間並不是割裂的，而相互雜

心與憤心》，收入林文月編：《臺靜農先生紀念文集》，頁232。

⁷⁹ 臺靜農：〈地之子·後記〉，《地之子》，頁176。

⁸⁰ 臺靜農：〈壓迫同性之卑劣手段〉，頁48-49；〈去年今日之回憶〉，《靜農佚文集》，頁58-59。

⁸¹ 施淑：〈臺靜農老師的文學思想〉，林文月編：《臺靜農先生紀念文集》，頁209。

⁸² 「抗戰時期重慶的文化氛圍較為保守，為民族主義、傳統文化的復興和保守主義的興起提供了最為適宜的土壤。由此而生較為興盛的舊體詩詞創作。」「同時，各種文化人的東來南渡、各類報紙雜誌的遷入與創刊，使新文化與本地傳統生成新舊雜處的狀態，新文化人物也要與革命耆老、舊派士紳相往來，參與詩詞唱和。」見劉奎：〈緒論〉，《詩人革命家：抗戰時期的郭沫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12-13。

⁸³ 此階段他寫的舊詩在當時皆未發表，2001年方由許禮平編訂結集，見許禮平編注：《臺靜農詩集》（香港：翰墨軒，2001年）。

⁸⁴ 此處文學革命、思想革命的傳統指新文化運動的傳統，臺靜農作為魯迅的

糅滲透，同為一個愈發明晰的主體意識的反映，因而在內容和取向上呈現相互呼應的關係。

抗戰期間臺靜農的批判對象主要集中於兩個方面，一是指向上層的專制主，亦即國民黨政權，如雜文〈讀《日知錄校記》〉中提到在「專制主的淫威」下，「人民就悄然的自相活埋」；⁸⁵ 小說〈錮黨史話〉是為「指明專制的覆亡之路」；⁸⁶ 舊詩〈讀元遺山四十頭顱半白生句有感〉中「鉤黨最憐烹五鼎，陳兵爭欲墜三城」直言蔣「清黨」濫殺及延宕戰機。⁸⁷ 二是指向發國難財者，喪失民族氣節的官僚、士人等，尤偏重後者，如雜文〈「士大夫好為人奴」〉借賣身吳三桂的士大夫諷今；⁸⁸ 〈魯迅眼中的汪精衛〉和〈「舉一個例」〉中直戳汪精衛的賣國「媚骨」；⁸⁹ 〈老人的胡鬧〉和〈讀知堂老人的《瓜

學生，承繼的是周氏兄弟由文學革命到思想革命的道路，見周作人：〈思想革命〉，《談虎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7-9；關於思想革命與文學革命的簡單脈絡，見王風：〈思想革命〉，王德威、宋明煒編：《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臺北：聯經，2019年），頁51-56。

⁸⁵ 臺靜農：〈讀《日知錄校記》〉，《靜農佚文集》，頁249-255。

⁸⁶ 臺靜農：〈錮黨史話〉，《靜農佚文集》，頁256-267。胡風主編：《希望》，〈錮黨史話〉，第2卷第4期（1946年10月）刊登時分類是「小說」，不知是主編的分類還是作者的考量，或可說明臺對小說和學術研究的一些看法，此處不細論。

⁸⁷ 臺靜農：〈讀元遺山四十頭顱半白生句有感〉，《臺靜農全集·白沙草龍坡草》，頁36。

⁸⁸ 臺靜農：〈「士大夫好為人奴」〉，《靜農佚文集》，頁93-95。

⁸⁹ 臺靜農：〈魯迅眼中的汪精衛〉，《靜農佚文集》，頁96-103；〈「舉一個例」〉，《青年生活》，半月刊第8、9期合刊（1939年），頁13，轉引自程桂婷：〈《臺靜農全集》補正〉，《魯迅研究月刊》，第1期（2017年1月），頁63-70。

豆集》)中將周作人比作錢牧齋，又諷他由蘇武而為李陵，⁹⁰更在〈記錢牧齋遺事〉中唾之：「禁不起霜雪的瓦，遇了微風也會裂的，——這沒有用的東西，只有讓他裂吧」；⁹¹舊詩〈孤憤〉：「長門賦賣文章賤，呂相書懸天下暗」諷刺蔣介石作《中國之命運》類似呂不韋作《呂氏春秋》，無人敢易一字，皆暗畏無言。而當時一些知識分子，還爭相投書給蔣，以博其稱譽為榮，如司馬相如賣〈長門賦〉一樣，是天下最賤的文章。⁹²對喪失氣節的「知識人」之貶斥，其實說明臺靜農依然思考和關注著「知識人」如何介入現實的問題，包括如何應對民族危難、專制權柄，如何克服時代的「暗面」，如何立身、挺住自己。歷史小說《亡明講史》中特別著墨史可法，塑造了在他這個時期的創作中難得的正面形象，亦是為強調某些值得堅守的正面價值，而不是為了故作犬儒姿態與表達虛無。⁹³這個階段他問題意識的突出特點是由「己」出發，與 1930 年代前後的茫然不知其位不同，有意識地先立住了作為「知識人」之主體，再試圖由對自身主體狀態的把握出發去容納和理解戰爭、革命等外部環境中的實踐。

⁹⁰ 臺靜農：〈老人的胡鬧〉，《靜農佚文集》，頁 129-135；〈讀知堂老人的《瓜豆集》〉，《靜農佚文集》，頁 140-145。

⁹¹ 臺靜農：〈記錢牧齋遺事〉，《靜農佚文集》，頁 248。

⁹² 解讀參見舒蕪〈憶臺靜農先生〉，收於陳子善編：《回憶臺靜農》，頁 65。同一篇文章中提到〈乙酉冬馬歇爾來作迎神曲〉是為諷刺馬歇爾以美國總統特使的身分來華，國民黨要人奔走逢迎的醜態（頁 58），亦可參看。

⁹³ 如王德威：「（前略）《亡明講史》則透露出他橫眉冷言、笑罵一切的犬儒姿態。（中略）他的犬儒姿態則暗示他看穿一切人性的虛浮和愚昧，進而嘲弄任何改變現狀的可能。如此，他筆下的史觀就不賦予任何一個時代，不論過去還是未來，本質上的優越性。」見王德威：〈亡明作為隱喻：臺靜農《亡明講史》（導論一）〉，臺靜農著、廖肇亨校注：《亡明講史》，頁 vii-xxiii。

「挺住自己」⁹⁴除了出自主體意志，亦不是無水之源。如前述，臺靜農的思想資源中有土之傳統中偏向「下傾性」的部分，他關心底層、關切社會大群體，但這一社會觀念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如交響樂的主調，在不同的樂章經重複變化而逐漸凸顯，抗戰時期，臺靜農的學術研究與創作中人間性與平民性（施淑語）⁹⁵遂漸成為關鍵字。1936年的〈從「杵歌」說到歌謠的起源〉中臺靜農已提到此文的目的是「從人類的實生活看出歌謠的起源」，⁹⁶但更側重於「人類學同社會學」等「自然科學方法」的運用，未特別強調民間性；在白沙的編譯館工作期間寫〈兩漢樂舞考〉時，平民性的取向已成為主脈，開篇即提出漢之雅樂疏簡，「放情之歌舞，終存於民間」，⁹⁷後續又辨析了後世民間戲劇、民間戲樂與漢樂府的關聯。同樣寫於抗戰期間的〈南宋人體犧牲祭〉也是對民間野蠻風俗的考證。⁹⁸小說《亡明講史》中除了史可法外，還有一處正面描寫十分特

⁹⁴ 尉天聰回憶臺靜農的文章中提到，臺靜農「（對學生和晚輩）最盼望的，是一個人要先在時代的激流裡挺住自己」。尉天聰：〈百年冰雪身猶在——記臺靜農先生〉，《回首我們的時代》（臺北：印刻文學，2011年），頁25。

⁹⁵ 施淑：〈臺靜農老師的文學思想〉，林文月編：《臺靜農先生紀念文集》，頁216。

⁹⁶ 臺靜農：〈從「杵歌」說到歌謠的起源〉，《臺靜農全集·淮南民歌集》，頁125。

⁹⁷ 臺靜農：〈兩漢樂舞考〉，《臺靜農全集·靜農論文集（上）》（鄭州：海燕出版社，2015年），頁11。寫作時間見臺靜農：〈致陳垣（1945年10月20日）〉，《臺靜農全集·臺靜農往來書信》（鄭州：海燕出版社，2015年），第22-23頁。

⁹⁸ 臺靜農：〈南宋人體犧牲祭〉，《臺靜農全集·靜農論文集（下）》（鄭州：海燕出版社，2015年），頁446-470。

別，是一位乞丐在南京城降清之際，用煤炭在橋上留詩「三百年來養世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隨後跳河就義，⁹⁹這當然是很戲劇化的情節，但其中的象徵意義卻十分明確，這樣的乞丐並不是晚明會出現的人物，而是現代才會有的新「民」之縮影。史可法與最底層之「民」的並置，共同守護的並不是忠君思想，而是以健全的國「民」意識為根底的國家意識和民族主義。臺靜農等「知識人」得以立身的基礎，是對民間（將）有此「國民意識」的期待和信仰，以及對自身創作和研究有益於「思想革命」和「國民意識」之啟蒙的信念。

在蜀期間臺靜農不但「知識人」的主體得以充實，與前階段分裂的狀態不同，革命意識的容納與吐露也更為舒適。1940年發表的〈填平恥辱的創傷〉應與寫於1924的〈途中〉對照來讀，〈途中〉寫了兩位從戰場上退下來的傷兵，當時的「我」還只是學生，儘管想幫助他們，卻只能捫心自問：「我有什麼力量能夠這樣做呢？」¹⁰⁰雖然「我」人道主義式地同情和理解他人的處境，仍是一名找不到社會位置的旁觀者，並無力打破作為知識人的「我」與大眾間的隔閡。〈填平恥辱的創傷〉中再次寫到的兩位傷兵命運相似的人：兩位前來接洽招撫的「土匪」，描寫了他們因時代擺蕩而遭受的磨難和無奈的選擇。但他不再將生命視為無能為力的悲劇，而是讚美他們「從荊棘中發現了坦途」，¹⁰¹同時，「我」不再是旁觀者，而是參與其中，成為了「土匪」和「K委員」間的聯繫人，幫忙協調傷兵到地方醫院養傷，並促成了一股三四百人的「土匪」加入／回到

⁹⁹ 臺靜農著、廖肇亨校注：《亡明講史》，頁149-150。

¹⁰⁰ 臺靜農：〈途中〉，《靜農佚文集》，頁8-15，引自頁14。

¹⁰¹ 臺靜農：〈填平恥辱的創傷〉，《靜農佚文集》，頁110。

抗戰的隊伍。文章的最後，「我」以同伴的心與這夥軍匪站在一起，「我們默默的相對著，然而彼此的心，光澈的映照著，就是將以……的血，填平恥辱的創痕」，¹⁰²使人不由得想到魯迅所說的「受一樣的壓迫，一樣的殘殺，作一樣的戰鬥，有一樣的運命」，¹⁰³此時，「我」的意識與狀態已經向革命現實敞開，不再置身於其外，而是與大眾聯結在了一起。寫這篇文章時臺靜農早已脫黨，雖已失卻革命黨員身分，卻更為輕鬆而篤定地內化了革命意識，投身於「血」的鬥爭中，情感的流露極為真摯。樂衡軍曾遺憾臺靜農在《建塔者》後未從「憤心」回歸常心、常性的「大悲心」，其實此文已足以說明他在四川白沙期間的回歸與超越，〈填〉中既有《地之子》中對苦難的同情與貼近，又有《建塔者》中對戰鬥與反抗的呼籲，更有「我」之融合了「知識人」與「革命人」的主體意識閃爍其間。

1946 年國立女子師範學院與教育部因「復員」問題發生衝突，臺靜農等教授都站在運動的前線，與學生一起罷課反抗，教育部只能解散女師，對「禍首」教師解聘、換發聘書，對學生以重新登記學籍進行分化，結果大部分學生都屈服了，臺靜農雖讚賞少數學生堅決不登記學籍的行為，卻又親自去請白沙地方上的聲望人士斡旋，幫助未登記的學生也保住學籍。他自己卻拒受新聘書，靠典衣為生。他在給林辰的信中寫道：「女院此次風潮，弟只有看不下去而引退，回想昔年女師大之事，對之惟有慚愧。然主教政者之橫暴，實亦勝於昔之大蟲耳」，¹⁰⁴臺靜農此次明確地反抗國民黨當局的行為，是

¹⁰² 臺靜農：〈填平恥辱的創傷〉，《靜農佚文集》，引自頁 110。

¹⁰³ 魯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魯迅全集》，第 4 卷，頁 290。

¹⁰⁴ 臺靜農：〈致林辰（1946 年 7 月 23 日）〉，《臺靜農全集·臺靜農往來書信》，頁 30。

其生涯中最為激烈鮮明的一次行動，雖自云相比當年女師大風潮感到「慚愧」，主要因反抗未果，而不是源於《建塔者》時期的無力感，他已在此次運動中盡了自己的力量。這次行動亦可視為其突破了瓶頸後的不肯甘休的「革命人」意識的溢出，也反映了其文學、內部精神實踐與外部實踐的行動統一性。

為把握一位作家的創作生涯，或許一是找到其生涯的每個轉折階段，分段進行分析，二是將其創作生涯視為連續的整體，尋找同樣的要素和關鍵字在每個階段的變與不變，而兩種方式視情況應結合使用，或許由於過度關注前者，臺靜農易被誤以為是一位職涯「斷裂型」的作家。但本文嘗試論證的，恰是臺靜農在生命的各個階段，都試圖連結自身理想（左翼的、新文化運動的）和實踐（文學的、外部的）的種種努力，而這是一個累進變幻的過程。從早年革命意識的萌芽，「知識人」到「革命人」實踐上的彷徨困境，到「知識人」與「革命人」在歷史巨變下終經淬煉相融於一身，他每個階段的創作雖有體裁、主題上的變化，也回應著不同的歷史事件和跡遇，卻始終環繞著拷問自身的強音。

如何處理「知識人」與「革命人」的關係是其主體意識鍛造過程中最關鍵的部分，前述已提及白沙期間臺靜農先立住了「知識人」之主體，方從對自身狀態的把握出發去容納革命實踐，但將時間線前推，其實亦是其青年時期的革命「志業」，滋養和支撐了文學的表達，使其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文藝實踐方式，¹⁰⁵ 在歷史的暴風雨中

¹⁰⁵ 同時也拓寬了各種體裁的內容與表現方式，如用歷史研究的方式寫雜文，用小說的方式表述歷史研究，將時事融入舊詩中進行嘲諷等等，其實都為這些體裁的拓展作出了貢獻，也延續著新文化運動的實踐。

找到了迎擊的力量，從「負傷的鳥」化身為「鼓翅飛向莽蒼處」¹⁰⁶的「海燕」。而 1930 年前後的實際具備黨員身分卻脫離實踐、找不到位置，與白沙期間的身處黨外卻在意識與實踐上都更為革命的對比，並非單純地指向對「黑暗的閘門」的厭倦與排斥，¹⁰⁷ 比起對外部組織的看法，臺靜農更多地是從自身的角度出發去思索應以何種方式理解「革命」和「革命人」，接受過的學術訓練和文藝情志又應如何與之相繫，於是得以鍛造出始終不滿足於現狀，對歷史和自身都始終保持批判與反思的主體意識，這種意識在其來臺後的生涯中也時刻朝向外部境遇開放著，調整變化著。重讀臺靜農來臺前的主體鍛造歷程，不僅可從個體經驗的角度為「革命人」之複雜意涵添一注腳，為解讀其來臺後的經歷與創作變化提供參考，亦有助於我們自身探索如何在變動不居的歷史情境中，在理想與實踐間去重構與發現自我，勇敢而自在地翱翔於人生的烏雲與大海間。

¹⁰⁶ 化自陳漱渝：〈鼓翅飛向莽蒼處〉，林文月編：《臺靜農先生紀念文集》，頁 137-148。陳漱渝文的題名化自臺靜農：〈負傷的鳥〉，《地之子》，頁 155。

¹⁰⁷ 臺靜農當然有自己的考慮，不然他 1937-1946 年的作品也不會大部分發表於「文協」相關的雜誌和胡風主編的雜誌上，而非當時更接近中共南方局的刊物，陳獨秀也不會寄〈我的根本意見〉與之分享。1941 年 12 月 7 日，陳獨秀在給臺靜農的信中寫道「奉上油印近作短文一篇，兄閱後，俟老舍回渝時請轉寄給他，白沙想少於國際政治問題有興趣之人可與一閱也」，這篇文章臺靜農似未收藏在手邊，或已交給老舍。但根據陳獨秀同時致函鄭學稼並贈〈我的根本意見〉油印件，可推測即是此文。書信轉引自吳銘能：〈《臺靜農先生珍藏書札（一）》試讀（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3 卷第 1 期（2003 年 9 月），頁 188-189。但臺本人並未對此留下任何記載或看法，且這是一個歷史問題，必須回到當時的歷史狀況下考量。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專書論文

1.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編：《「革命文學」論爭資料選編（上、下）》，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
2. 王風：〈思想革命〉，收入王德威、宋明煒編：《五四 @100：文化，思想，歷史》（臺北：聯經，2019年），頁51-56。
3.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4. 李霽野：《李霽野文集·第2卷》，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
5. 林文月編：《臺靜農先生紀念文集》，臺北：洪範書店，1991年。
6. 周作人：《談虎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7. 胡適：《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0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
8. 姜濤：《公寓裡的塔》，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9. 唐弢：《中國現代文學史（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
10. 陳子善編：《回憶臺靜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
11. 尉天聰：《回首我們的時代》，臺北：印刻文學，2011年。
12.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13.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版）·第2集》，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4. 程凱：《革命的張力：「大革命」前後新文學知識份子的歷史

- 處境與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
15. 舒衡哲著，李紹明譯：《張申府訪談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 年。
 16. 楊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會」觀念的形成與新型組織的誕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
 17. 臺靜農：《臺靜農全集》，鄭州：海燕出版社，2015 年。
 18. 臺靜農：《地之子》，臺北：遠景，1990 年。
 19. 臺靜農著、陳子善、秦賢次編：《靜農佚文集》，臺北：聯經，2018 年。
 20. 臺靜農著、許禮平編注：《臺靜農詩集》，香港：翰墨軒，2001 年。
 21. 臺靜農著、廖肇亨校注：《亡明講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20 年 5 月。
 22.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
 23. 魯迅：《魯迅全集（編年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 年。
 24. 劉奎：《詩人革命家：抗戰時期的郭沫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年。
 25. 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年。
 26. 羅聯添：《臺靜農先生學術藝文編年考釋（上、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 年。
 27. 龔鵬程：《近代思想史散論》，臺北：東大圖書，1991 年。

二、期刊論文

1. 王翠豔：〈臺靜農佚詩《村落》《桃林》釋讀〉，《現代中文學刊》，第2期，2020年4月，頁60-64。
2. 吳銘能：〈《臺靜農先生珍藏書札（一）》試讀（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3卷第1期，2003年9月，頁141-191。
3. 汪成法：〈《魯迅全集》內外的孫祥偈〉，《魯迅研究月刊》，第5期，2014年5月，頁55-58。
4. 程桂婷：〈《臺靜農全集》補正〉，《魯迅研究月刊》，第1期，2017年1月，頁63-70。

三、學位論文

1. 賴柏霖：《臺靜農先生小說研究》，臺北：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9年。

